

望在實地與非洲國家交換意見，瞭解非洲各國的實際需要之後，爲尼克森撰寫一個特別而切乎實際的報告，一方面做爲制定新政策的基礎，也可藉此說服國內民意，支持美國在處理非洲問題時，能够採取一種較爲積極的態度。

伍 結論

美國之需要非洲，正如非洲之需要美國一樣。無論基於任何觀點，非洲需要美國的協助，在安定中求發展。而美國之需要非洲除了在軍事、政治、經濟的利益觀點而外，當今國際冷戰日趨激烈，美國如想在國際場合中維持強有力的發言地位，無疑的也需要非洲國家的支持。但顯而易見的，即使在匪俄極力向非洲國家滲透的今日，美國似仍未感到危及自身的安全，也不會覺得有任何壓力迫使其改變這種觀點。美國希望的是，共黨勢力不要進入非洲，美國就可避免增加其國際責任，而讓非洲國家在安定中自由發展。

美國的非洲政策受到很多牽制。例如，現在美國公民十人中就有一個祖先是來自非洲大陸的。如果美國內部促進種族團結的行動獲得發展，黑人地位不斷獲得改進，美國在非洲的聲望與信任亦將同樣的獲得增加。反之，假如美國內部的種族衝突漸趨擴大，黑人遭受歧視與虐待，美國在非洲的聲譽亦將遭受不利影響。其次，美國在越南及其他地區的行動，經常爲共黨宣傳

用作介入別國事務。非洲各國對越戰的實質少有瞭解，因而美國多少要受到不利的影響。美國早期的非洲政策，一度被非洲國家認爲是殖民主義之支持者的印象，至今仍鮮明未褪，這也是美國不能積極展開對非外交的因素。事實上，由於美國國會近年來大幅削減對非洲的援助，使目前每年維持一億六千萬元的水準，美國在處理非洲事務上也確實難有作爲。

尼克森在二月十八日的世局咨文中，曾提到非洲問題。他說：「目前非洲國家所面臨的是許多艱鉅的工作和困難的抉擇……基於目前發生的許多危機，我們將不再只以許多空泛的詞句表示我們的關懷，而將以實際的且更具建設性的方式，表示我們對非洲各國的支持」。他希望非洲國家能避免任何強權在該地做任何形式的衝突與鬥爭，使非洲國家能够在安定的情勢中，發展成一個健全和富足的地區。單就這些言論，我們不敢奢望美國今後在處理非洲事務時，會有任何較以前略爲積極的表現。只希望在匪俄積極滲透此一地區的今天，美國至少應該以實際行動維護此一地區，使其能够在安定中求發展。如果徒然高喊讓這些國家自決今後的前途，而不提出任何的安全保障，非洲國家在面臨國內問題，與匪俄滲透的雙重威脅下，根本無法自由選擇。待事實既成時，美國即使以比現在援助非洲多十倍的努力，恐亦難挽回局勢，未雨綢繆，美國當局者宜早思之。

巴西共黨內部鬥爭與武裝叛亂

王建勳

共匪爲使巴西成爲其在南美洲活動的基地，曾大事滲透，使巴西共黨一統的局面，也有了分裂的跡象。一九六四年三月，左傾的古拉政權被軍事政變所推翻，共匪的陰謀始被揭露。但其後因巴西政治與社會的混亂逐漸增加，國際共黨間分歧日趨擴大，以及巴西共黨內部鬥爭激烈化，隨之而起的共黨武裝叛亂勢力，曾使巴西面臨顛覆危機。一九六九年十月，新任巴西總統麥迪西將軍，以滅腕剿共，迄今雖使共黨武裝叛亂遏止；但親蘇的共黨又乘機開始活躍，企圖擴大共黨團結，重建巴西共黨的勢力。

壹 巴西共黨的內部鬥爭

巴西共黨(Partido Comunista Brasileiro)已有四十年的長久歷史，從一九四五年，一直都在頗具影響力的貝西蒂斯(Luis Carlos Prestes)領導之下(註一)。到一九六一年，美國第廿屆共黨大會以後，由於匪、俄爭論的影響，巴西共黨一統的局面開始發生動搖。一九六三年底，共匪向巴西進行大規模滲透計劃，而使巴西「共黨中央委員會」中一些重要頭目如阿馬松那斯(Joao Amgonas)、格拉勃伊斯(Maurice Grabois)、以及波瑪哈(Pedro Pomar)等，領導一小撮共黨份子另組「巴西新共黨」(P. C. do B.)。他們反對所謂「修正主義」，主張「武裝鬥爭」，而開始走共匪的路線。分裂後的巴西共黨(P. C. B.)雖仍擁有多數繼續參加「修正主義

「路線的共黨份子，但貝西蒂斯在巴共中的聲望已受到很大打擊。

不久古拉（Joao Goulart）執政，因為他的左傾，使巴西共黨很容易向政府滲透；特別是共黨已佔據了政府各重要部門。亦由於巴西共黨的勢力擴張，一時彌補了共黨內部分裂的危機。當古拉政府經過共黨的滲透，極可能轉變為赤化的危機時，就引起巴西人民的反抗和招致軍事的干預。結果，一九六四年三月卅日，軍人領導政變推翻了古拉政府。自此，巴西共黨遭到軍事政府嚴厲的壓制；很多共黨重要頭目及共匪支援顛覆份子被捕，而被迫停止活動。惟在這段期間，軍事政府未能確實掌握共黨情況，以致那些逃亡的共黨首腦們，又在秘密中恢復了巴西共黨的組織。他們組成兩個委員會；其一是「執行委員會」，由貝西蒂斯及戴阿斯（Gicomo Dias）、阿爾維斯（Mario Alves de Souza Vieira）、馬利蓋拉（Carlos Marighela）、古朗地（Jacob Gorerder）等五人組成。這些份子，都是從一九四二年以來，巴西共黨中央委員會的委員，因為他們都出生在比亞亞（Bahia）州，所以一般都稱他們為「比亞亞集團」（Baiano Group）。他們代表着巴西共黨組織的核心，亦是權力中心，經常担任着共黨重要任務。其二是「中央委員會」，由廿三個委員組成，每一委員都代表一個地區和一種不同的任務。如貝西蒂斯是代表聖保羅的政治，戴河斯是代表瓜那巴拉的政治，巴蒂斯培（Miguel Batista）代表里約熱內盧的政治，馬利蓋拉是代表瓜那巴拉的組織，萊維爾（Manuel Jover Teles）代表瓜那巴拉的工會，佛朗斯哥（José Francisco）代表依斯比利多的新聞，奧瑞路（Marco Aurelio）代表巴西里亞的議會，梅朗達（Jaime Miranda）代表阿拉哥艾斯的新聞，馬蘭諾（Luis Maranhao）代表北大河的議會，彭阿維地斯（Anibal Bonavides）代表巴阿拉的議會等等。

就在巴西共黨組織剛恢復不久，就又遭到嚴重的打擊；一九六四年六月，巴西警方在一次突擊行動中，有共黨「中央委員會」候補委員阿隆依達（Neri Almeida）被捕，並在貝西蒂斯的居處處獲共黨重要文件。這是巴西共黨在第一次失敗以後，重新恢復組織以來，所有巴西共黨的組織、行動與計劃，均已落入警方手中。於是巴西共黨陣營中，就引起了內鬨；很多共黨份子憤怒的指責貝西蒂斯遺失黨內機密文件，是犯了嚴重錯誤。其中馬利蓋拉更威脅着要殺害貝西蒂斯。巴西共黨內部無情的鬥爭，已使貝西蒂斯的地

巴西共黨內部鬥爭與武裝叛亂

位發生動搖。隨後就由「比亞亞集團」改組巴西共黨為一三人領導的局面，並解除貝西蒂斯所有領導上的職務。

巴西共黨中的「武裝鬥爭」（P.C.do B.），一直都在尋找一個適當的機會來打擊走蘇俄「修正主義」路線的共黨。所以當貝西蒂斯失落機密文件以後，他們就攻擊貝西蒂斯無能，認為是不可原諒的錯誤，他們藉口已使巴西共黨冒着「粉碎」的危險，而企圖奪取共黨整個領導權。但是仍有大部份共黨份子支持貝西蒂斯，並繼續「修正主義」路線，使巴西共黨再度分裂成所謂「修正主義」及「武裝鬥爭」兩派。而貝西蒂斯為重振對巴西共黨領導權，就引起了一個亂哄哄的會議。

貳 巴西共黨的擴大分裂

三年中，貝西蒂斯亦為努力達成共黨內部團結，而發動一個理論鬥爭，但因受到國際共黨間紛歧惡化的影響，已普遍發生困難。尤其是在巴西共黨（P.C.B.）當中，一些游離份子，因受着巴西共黨分離運動的影響，亦對巴西共黨遠景，陷入悲觀。因此，仍受着莫斯科支持的貝西蒂斯，為挽救此一危機，就於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召開了第六屆「巴西共黨大會」。

在這次會議中，共黨領袖們均作了嚴格的檢討與批評，但是却很小心。據貝西蒂斯的報告，表示他們的錯誤，主要是在軍事政變以前，沒有看到國內非共保衛民主政治的一股大的力量，而只是以一種激進的政策，合法的鬥爭，從事對政府的分化。所以當軍事政變爆發，共黨就不能領導羣眾採取報復。共黨領袖人物，在這一觀念上，就承認巴西共黨與古拉合作的目標雖很正確，但因操之過急而失敗。因此主張巴西共黨未來鬥爭方面，必須加強「羣眾運動」，「工人運動」以及「民主」與「民族主義運動」的關聯與影響，先建立一個「民主」而反「帝國主義」的革命政府，給「無產階級革命」打開一條通往「共產主義」的路。同時在大會中亦譴責了共黨的「武裝鬥爭」，認為巴西人民大多數都不同情共黨的「暴力革命」，如果要保證巴西共黨革命的勝利，就不能受幾小股共黨武裝叛亂組織的影響，而失去大多數的羣眾。最後大會呼籲巴西共黨要緊密的與國際共黨合作，以巴西共黨堅持「俄共」路線，來保障未來「世界共黨大會」的成功。（註一）

當國際共黨紛歧擴大之際，巴西共黨陣營出現「修正主義」並不是偶然

的。但是在古拉政府時期，巴西共黨採取所謂「修正主義」路線，亦是為適巴西當時的特殊情況；那就是巴西共黨已可預見以「合法鬥爭」的方式向政府滲透，將可逐漸獲得政權，因此，在「社會革命」方面，就不需採取暴力方法，而企圖以騙取國內工、商業「資產階級」的支持，來推翻地主們的特權。如此就必須要配合「修正主義」路線，而加深了「資產階級」對其革命鬥爭的影響，使「合法鬥爭」與「自由化」在「修正主義」上面，成為巴西共黨一個決定性的路線。只是一九六四年三月的軍事政變已使巴西共黨在這方面的活動轉趨惡化，不僅「武裝鬥爭」共黨猛烈攻擊，其後不斷增加中的學生暴亂，也指責巴西共黨領導階層採用「修正主義」的路線。因此，第六屆「巴西共黨大會」不但未能挽救共黨內部更加紛歧；一部份共黨份子要以「和平方法」來轉移「資產階級」的權利到「無產階級」，因此，主張「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間的鬥爭，必要遵循「和平鬥爭」與「妥協」原則。另一部份共黨份子則認為「勞工階級」與「資產階級」的對抗，是必然的一種矛盾，故採取「暴力革命」是不可避免。隨着這兩種不同的觀點，巴西共黨內部又產生新的爭論。(註三)

這種爭論，由於「武裝鬥爭」共黨利用學生暴亂的發展並不理想，而有了新的分裂。「武裝鬥爭」共黨雖然要使學生的示威與暴亂成為阻撓巴西共黨主張「傳統路線」的最大力量，但是「武裝鬥爭」共黨在利用學生「衝擊」方面，雖符合共匪所操縱的「巴西學聯會」的目標，但却無法達成長久而有效的控制。當從事「民主運動」的「擴大陣線」亦企圖掌握「學生運動」的時候，很多學生都與他們失去聯繫。因而三者間為爭取對「學生運動」的領導權亦展開了鬥爭，使「武裝鬥爭」共黨，在領導「學生革命運動」方面，就有了「魂不附體」的感覺。所以在巴西共黨陣營中，無論是「修正主義」派份子或「武裝鬥爭」派份子，在他們看到不能長久支配學生擴大暴亂方面，而巴西共黨在「玩弄」工人革命」以及各地區共黨基本組織擴張上，亦均尚未打開有利情勢的階段中，就認定要加緊利用工人從事暴動。於是一些已經動搖的「修正主義」份子及從第六屆「巴西共黨大會」以來，不斷被排除的共黨份子，就又發展成兩個不同的共黨組織；其一是「巴西革命共產黨」(P.C.B.R.)，其二是「巴西工人共產黨」(P.O.C.)。

一、「巴西革命共產黨」，是由曾經從事新聞工作的阿爾維斯(Mario Alves)及格蘭地爾(Jacob Gorder)兩個老共產黨徒所領導。他們自認是「馬克斯」與「列寧」主義的真正黨徒。他們主張建立一個以左傾工人及所謂「真正革命份子」為中心，而能完全傾向於「無產階級」革命的共黨新組織。他們在意識方面遠離「修正主義」路線，但亦不接受「武裝鬥爭」的概念，不贊成「游擊戰」的理論，而亦不同於「武裝鬥爭」的共黨(P.C.to B.)。

二、「巴西工人共產黨」，是由南大河州一些反對「修正主義」及「托派」份子所組成。這個共黨組織的產生，主要是由於鬥爭策略紛歧的關係。所以該組織經常譴責一般的工會組織，而自誇是一個真正代表「勞工階級」的共黨組織，要在巴西共黨鬥爭中，成為一個最「進步」的共黨組織。他們強調「修正主義」的必然衰退，主張利用左翼工人組織從事城市恐怖活動，配合鄉村的「游擊戰」，以達成他們的目標。因此，他們認為利用勞工組織是達成赤化奪權的真正力量。

所以從一九六四年以來，原已分裂的巴西共黨，經過第六屆「共黨大會」，迄今更是四分五裂。而分裂出來的這些共黨組織，其所表現於「傳統」共黨革命方式的不合時宜，及接連於他們在革命理論與方法上的紛歧，亦彼此對立，誠然的，已使巴西共黨(P.C.B.)勢力大為衰退。所以從第六屆「共黨大會」以來，巴西共黨(P.C.B.)的組織就不斷縮小，到目前只有貝西蒂斯與萊維爾等十數人繼續支持慘局。但無論如何，巴西共黨(P.C.B.)相應着巴西情勢的改變，面臨共黨不斷分裂的打擊，亦企圖修改一種能適應共黨團結的立場，所以在一九六九年間，巴西共黨(P.C.B.)亦曾聲言承認在當前的環境中，其「暴力革命」鬥爭是不可避免的，但表示巴西共黨為儘可能達成統一與團結，應尋求一個適當的方法，採取一種共同的行動，以確定巴西共黨能獲致勝利的保證。但是從一九六八年初以來，馬利蓋拉單獨領導共黨實行更激烈的「暴力革命」方面，已使這個呼聲不能發生任何反響。

叁 巴西共黨武裝叛亂的蔓延

巴西共黨武裝叛亂組織，是起源於古拉執政時期。當時古拉政府左傾，共黨積極向政府滲透，前南大河州州長、左傾的工黨領袖、古拉總統的親戚

勃里索拉 (Leonel Brizola) 就乘機組成半公開的所謂「十一人小組」的一支武裝隊伍。(註四)在古拉被推翻以後，該組織即潛入地下，從事秘密活動，而逐漸演變成共黨武裝叛亂的力量。所以巴西共黨武裝叛亂的發展，是有着多次的變遷，但大致可分為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從一九六四——一九六五年)古拉政府被軍政府推翻以後，勃里索拉逃往烏拉圭，「十一人小組」武裝組織就由一名共黨份子阿爾維斯·賽爾華 (Ladislav Alves de Silva) 繼續領導。當時這個組織只是要「擊潰獨裁」政權，沒有任何名稱和計劃，尚不確定屬於共黨「武裝鬥爭」的組織。至一九六四年六月，「武裝鬥爭」共黨 (P.C.do B.) 在南大河州的比羅塔斯 (Pelotas) 地方，秘密設立「游擊戰學校」，專門訓練「十一人小組」的隊員，授予在「武裝鬥爭」方面的組織及作戰等各種技能。其後「巴西高級農業經濟研究院」院長，共黨份子狄亞斯 (Tholozan Dias da Costa)，表面以發展土地改革教育為掩護，實際上是在該校成立「游擊隊訓練中心」，訓練各種武裝顛覆的技能。並且同年八月又成立「人民解放軍最高司令部」(Commando Supremo de Libertação Nacional)，從此就確定了「十一人小組」武裝鬥爭組織、顛覆活動、作戰策略，以及對「敵人」審判的各種規定，而以共黨「武裝革命鬥爭」的理論，代替了以前勃里索拉領導「十一人小組」的概念。他們在理論方面認為「十一人小組」是共黨「武裝革命鬥爭」的「前鋒」，主要的「工具」，就如同一九一七年蘇聯「社會主義革命」時的「紅衛兵」一樣。這時巴西共黨武裝叛亂就追隨了史魔與毛匪的思想，並打起所謂「無產階級革命」的旗幟。但是到了一九六五年春季，在政府軍一次清剿行動中，而使共黨武裝叛亂首次遭到挫敗。那些由卡爾地母 (Jefferson Cardim de Alencar Osorio) 所領導在巴西西南部邊區的「十一人小組」武裝叛亂份子，就有二百人被捕，而使共黨的武裝叛亂，一時停止下來。

第二階段：(從一九六五——一九六八年)，共黨「十一人小組」武裝叛亂失敗以後，就由奧哥斯多 (Edival Augusto de Melo) 集合殘餘的共黨叛亂份子，模仿玻利維亞共黨在山區從事武裝叛亂的方式，亦在巴西卡巴拉歐 (Serra de Caparaó) 山區中發展共黨游擊隊。奧哥斯多在一九六四年三月軍事政變以後，就逃往墨西哥，而後轉往古巴，在那裏接受了游擊戰

訓練，然後他取道烏拉圭與勃里索拉取得聯繫，返國後就積極誘惑農民參加共黨游擊隊。不久這支山區中的游擊隊就擁有各種武器及裝備，包括無線電通訊在內。接連着在山區建立很多據點，有古巴的飛機經常與山區中各游擊隊保持聯繫。但是他們分散在卡拉貢達·地阿布 (Garganta da diabo)、貝卡塔·拉都斯 (Picada dos Ladros)、布地哈 (Bojio)、卡巴拉歐 (Caparaó) 等山區的共黨游擊隊，因為不能受到當地人民的支持，以及缺少游擊作戰的經驗，當政府軍又一次清剿時，非但無法作戰，亦無法困守據點，而告紛紛逃亡。以致在這次戰役中，不但他們的頭目奧哥斯多被捕，尚有廿六個曾參加第一階段的共黨叛亂份子被俘，其中有一位是里約熱內盧哲學院的教授戴馬利亞 (Bayard Demaria Boiteux) 和幾個其他拉丁美洲國家人員。

第三階段：(從一九六八——一九六九年)巴西共黨武裝叛亂第二次失敗，正是巴西共黨擴大分裂的時候。當時巴西共黨陣營各派份子，多已被武裝叛亂的理論所吸引，認為在巴西共黨「武裝革命」，已是不可避免，贊成利用學生與工人的暴亂，推動共黨武裝叛亂的準備。原不接受「武裝鬥爭」的「巴西革命共產黨」(P.C.B.R.) 亦在此際改變了原來的立場。因此，「巴西革命共產黨」亦從事訓練武裝叛亂份子，加強學生與工人的暴亂組織，並聲言如無武裝力量，就無法發展，更無法推翻政府。

儘管「武裝鬥爭」共黨 (P.C.do B.)、「巴西革命共產黨」(P.C.B.R.)、「巴西工人共產黨」(P.O.C.) 都贊成「暴力革命」，然而由於他們彼此分立，多少都使他們的行動受到牽制。即使「武裝鬥爭共黨」，從他們追隨共匪路線上從事「暴力革命」的計劃，亦因為沒有羣眾組織，而無法以有限的暴力活動來引起大規模的「人民革命」。在這種情況下，就有最激烈的共黨「暴力革命」份子馬利蓋拉為要擴大「游擊戰」的觀念，而意圖把巴西各派共黨均統一在他的「武裝鬥爭」策略下，以達成攫取政權的目的。(註五)

馬利蓋拉是一九二一年出生在巴宜亞州，父親是義大利人，母親是巴西黑人。他是巴西共黨最激進的代表。他十六歲時就是共產黨，曾被瓦加士政府所監禁。一九四五年大赦以後當選了巴西共黨的委員。一九四五年，巴西共黨被禁，他即轉入地下。廿年以來，他都忠於「傳統派」共黨，只是在古

拉政府被推翻，巴西共黨中有80%的重要份子脫離組織，他才另起爐灶，獨樹一幟，開始與共匪及古巴秘密來往。一九六七年八月潛往古巴，參加哈瓦那召開的第一屆「拉丁美洲人民團結組織會議」，返國後就以卡斯楚及蓋瓦拉(Che Guevara)的信徒自居。他為了領導共黨擴大暴亂，開始籌措經費，乃多次搶劫銀行，獲款達七十萬美元之多。

在此以後，馬利蓋拉認為共黨「武裝鬥爭」是唯一爭取勝利的辦法，因此，他接受「卡斯楚」及「蓋瓦拉」的經驗，主張發動反「帝國主義」及反「軍事獨裁」的游擊戰，並且他要使巴西共黨游擊戰接合整個拉丁美洲共黨武裝革命的戰略，使巴西共黨「游擊戰」成為全面的「人民革命」戰爭。他這個策略會分三個階段進行：第一階段是建立共黨「武裝鬥爭」的核心，這個核心必須要一致反對「修正主義」路線。第二階段是建立一種理論，誘使羣衆相信並支持共黨武裝叛亂的目標。第三階段是利用農民及工人的組織為主要力量，開始游擊活動。所以在他發動共黨「游擊戰」方面，就特別注意到共黨武裝叛亂的方法，以及在武裝暴動鬥爭上的「政治」目標。從一九六八年三月巴西爆發大規模學生暴亂以來，馬利蓋拉即結合各派「武裝鬥爭」共黨，成立所謂「十月八日革命運動」(簡稱M.I.R.—8)(註六)。他們不再使用游擊隊據點，而儘量利用國內反「獨裁」、反「帝國主義」的風潮所造成的社會混亂情勢，以掀起全面不安為目的。他們以一種新的策略，把組織力量分散，以小股突擊行動，加強城市中的「游擊戰」。如此，不但可以減少行動上的負擔，亦可分散政府軍的力量，以避免政府軍包圍。而最主要的，亦是儘量減少有形的組織，以掩護其整個叛亂系統的政治意向。但是最終目標，仍是將各地區的獨立叛變，擴張成為全面的叛亂。

肆 巴西共黨的未來動向

巴西從一九六九年三月以來，「民主運動」、「宗教運動」，經過「武裝鬥爭」共黨推波助瀾，而使巴西所有反政府勢力都逐漸變質，尤其那些所謂激進的左傾聖職人員，也助長了共產主義「階級鬥爭」與「社會革命」的風潮。當一九六九年九月間「武裝鬥爭」共黨綁架美國大使艾爾布列克(Bur-

ke Elbrick)，共黨武裝叛亂已發展成巴西最嚴重的禍患。因而在一九六九年十月，新任巴西總統麥迪西將軍就職以後，立刻就展開大規模剿共行動，尤其巴西警方，利用共黨內部矛盾，掌握線索，十月七日，共黨武裝叛亂的頭目馬利蓋拉，就在聖保羅被埋伏的軍警所擊斃。接着另一領袖人物拉馬哈克(Carlos Lamarca)亦在礦產州被捕。從此巴西各地的共黨暴亂立即退止，同時軍警在各大城市如巴西里亞、勒希菲、古瑞蒂巴搜捕結連於馬利蓋拉武裝叛亂組織的份子達數百人，其中包括有神父及學生。由於共黨武裝叛亂組織一一破獲，而使整個共黨「武裝鬥爭」力量隨之瓦解。

但是巴西共黨武裝叛亂的再度失敗，使巴西「傳統派」共黨(P.C.B)又有了新的轉機；那些「傳統派」共黨份子立刻又開始活躍，飛機重整，尤其是前工黨領袖、伯南布哥州州長、極為左傾的人物阿拉地斯(Miguel Arraes)最近在巴黎呼籲巴西所有左派團體實行大團結。而在「武裝鬥爭」共黨方面，雖然現在墨西哥的前共黨「武裝鬥爭」的重要頭目達瓦瑞斯(Flavio Tarres)已聲言要重返巴西，繼續馬利蓋拉重建共黨武裝叛亂的勢力。(註七)但以巴西人民具有一種傳統和平的特性，尤其是大多數農民沒有共黨所謂的「革命意識」，工人又缺少全力支持的現象，仍會遭遇第四次的失敗。加以當前蘇俄決心要排除「暴力革命」的影響，巴西「武裝鬥爭」共黨的前途，今後將更為暗淡。

註一：請參閱 *Tableau des partis politiques en Amérique du sud*, P.134.

註二：請參閱 *Le Monde*, 1968, 4/1, 7/2

註三：請參閱同註一。

註四：勃里索拉(Leonel Brizzola)與前勒希菲州長阿拉地斯(Miguel Arradis)都屬於左傾的工黨領袖人物，當初他們曾企圖在巴西發展一支「民族解放軍」的武裝隊伍。

註五：請參閱 *Le Monde*, 1969, 7/9.

註六：請參閱同註五。所謂「十月八日革命運動」，是為紀念古巴共黨頭子蓋瓦拉於一九六七年十月八日被玻利維亞陸軍擊斃的日子。

註七：請參閱 *Le Monde*, 1969, 9/10.